

人大表決一錘定音 「一地兩檢」勢必落實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實施「一地兩檢」決定草案，不但意味「一地兩檢」三步走程序已經完成了第二步，更釐清了「一地兩檢」的法律爭議，發揮了一錘定音的作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並擁有基本法的解釋權，人大常委會就「一地兩檢」作出的決定，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毋庸置疑，更不容推翻。

反對派一直以違反基本法為由反對「一地兩檢」，隨着人大表決通過實施「一地兩檢」決定草案，有關的爭議已不存在。況且，西九龍站的「內地口岸區」只是以租用方式交給相關單位使用，不涉及任何業權轉移，何來「割地」？內地執法人員亦不會離開「內地口岸區」去別處執法，彼此涇渭分明，又何來破壞「一國兩制」？為配合高鐵香港段通車，為追回香港失去的時間，「一地兩檢」勢在必行，反對派如果要在本地立法上攪局，只會輸得更慘。「一地兩檢」安排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通關便利，方便香港市民，目的相當純粹，根本沒有什麼政治上的考慮。而

一直將「一地兩檢」肆意政治化，正正是反對派之流。他們將「一地兩檢」聯繫上各種政治隱測，什麼方便公安在關口抓人、「侵蝕」香港高度自治等經不起事實推敲的指控，並指「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精神云云，完全是捕風捉影、上綱上線。

奠下法律基礎粉碎反對派謠言

現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實施「一地兩檢」決定草案，明確其符合「一國兩制」，符合憲法和基本法，將為「一地兩檢」奠下法律基礎。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基本法的解釋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批准後的有關決定，具

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不僅適用於內地，也同樣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等於為「一地兩檢」奠定了穩固的法律基礎。在人大決議之後，有關「一地兩檢」的法律爭議將不再存在，反對派要繼續糾纏所謂法律問題只是徒勞。

事實上，特區政府提出的「一地兩檢」方案，主要參照深圳灣口岸的運作模式，有先例可循。而西九龍站土地由特區政府使用、開發、出租，收入歸特區政府支配。「內地口岸區」只是以租用方式交給相關單位使用，不涉及任何業權轉移，根本不存在所謂「割地」的問題，更沒有違反「一國兩制」，在法理上具有毋庸置疑的理據。反對派過去從來沒有尊重過基本法，在政改問題上更公然提出違反基本法的方案，現在為狙擊「一地兩檢」又搬基本法出來，根本是別有用心。現在「一地兩檢」的法理依據已經十分清楚，反對派仍要「盲反」，不過是輸打贏要，為反而反，不會得到市民的認同。

其實，「一地兩檢」並不只是法律問題，也是政治問題。「一地兩檢」不論

在外國或兩地早有先例，反對派對「一地兩檢」窮追猛攻，醉翁之意並不在法律，而是政治，肆意將「一地兩檢」政治化、形容為洪水猛獸，甚至加上各種天馬行空的臆測，目的不過是要將「一地兩檢」妖魔化。

然而，反對派不斷渲染各種誇張情景，抹黑「一地兩檢」，根本影響不了市民，原因很簡單：每日數十萬計的市民都會通過不同的關口進出內地，當中也包括反對派的支持者，他們每日都如常過關親身經歷，從來不會出現什麼問題，現在反對派政客卻將關口說得危機四伏，更詆指什麼侵蝕兩制，怎可能令人信服？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反對派抹黑「一地兩檢」，根本影響不了市民。

「一地兩檢」受阻香港將被邊緣化

廣大市民都理解到，高鐵路不但為港人北上內地城市帶來極大的便利，更讓香港的高鐵網與內地「八縱八橫」的高鐵網連成一體，經濟效益難以估量。毋庸諱言，現在唯有「一地兩檢」可以全面發揮高鐵的效

益，其他方案如「車上檢」、「兩地兩檢」都會令高鐵路效益大打折扣，違反了當初興建的原意，既不可行，也不可取。如果香港竟然捨棄最佳的「一地兩檢」

而聽從反對派所謂「替代方案」，等於自廢高鐵路武功，將高鐵路變成廢鐵。

現時「一地兩檢」方案，在經濟效益、法律以至「一國兩制」等方面，都沒有可爭議之處，甚至坦率而言，在內地的可爭議之處，沒有香港這一段影響不大，反而是香港連結不上內地的高鐵網，損失的不只是800多億元的工程開支，而是內地的巨大市場和商機，只會被進一步邊緣化，不實行「一地兩檢」究竟對香港或是內地影響更大，其實早已不說自明。在高鐵工程上，香港已經失去了太多的時間，浪費了太多的機遇，人大表決一錘定音，「一地兩檢」勢在必行。反對派繼續「盲反」「一地兩檢」，等於與香港發展為敵、與港人福祉為敵，肯定會輸得更慘。



引中外科創文創旗艦 展本港制度人才優勢

許楨 博士 中大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誠如本欄一再強調，任何一國一地之政府，不管文化背景如何、經濟條件如何，其最大之功能，往往在於為社會上下把脈——認清問題癥結，方可找對切入點，進而徹底解決之。當內地省市領導都明了「純GDP主義」之片面，港府便尤需注重發展成果的分配、可持續，以及不容許量度的溢出效應，比起經濟規劃的膨脹重要得多。

來到本系列最後一篇，綜前所述，以「歷史唯物論」為脈絡，當世經濟產業可分為源自封建社會的「前工業型」；維多利亞時代以降，以舊式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為框架的「工業型」；以及冷戰結束以來、資訊時代的「後工業型」。「工業型」的根本是生產工具，由於工廠、材料、能源、運送工具的資本化，因此，「工業型」經濟，無一不以銀行、保險、會計等金融業的興起為特徵，如以英、法、德、日為例。

「前工業型」亦即封建時代發展模式的轉化——房地產仍舊保留透過控制土地來控制勞動產出的本質。小家庭月入、小企業收入縱有增長，卻永遠抵不過租金升幅，此乃「前工業型」產業模式之必然。土地掌控者在宏觀、微觀經濟體系中的角色都不是生產者，而是「代收稅者」。房地產的排他性最高、競爭性卻最低，已被當代經濟學界目為定律。

而「新經濟」縱然千頭萬緒，透過腦力勞動創造新需求、新模式、新產業的特性卻明顯而歸一。愚以為，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向為香港金融界最具視野、抱負之一員；梁氏指出拒絕阿里來港不當，筆者的理解是，阿里來港問題的本質，並非「同股不同權」，而是本為不同股，何來同權之理？該事件可視為香港社會與公權力，面對世道改變再一次失焦爭論；我們並非與某巨企，而是與這個時代失諸交臂。

智力培養將成為生產力之本

在「後工業」時代，創業者的開拓精神、對世界

新動向的把握，比掌握資本更能推動發展；否則，又豈有蘋果、臉書、阿里、騰訊稱雄中、美股壇之理？對於企業創始人股權的保護，既是對腦力勞動、知識產權的尊重，也確保了越來越「初創企」的萌芽與大爆發。

粗通《資本論》者自會明白，資本對勞動者，包括腦力勞動者的盤剝，終將危害整個社會的創新和利益。嶺大許寶強教授，多年來在港指出「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的內在緊張；筆者且進而斗膽說，「市場經濟」出現在「封建時代」、發展在「資本時代」，最終，將帶來「社會主義」、並與之相合。包括香港人在內的中國人具歷史責任，以經濟實踐來論證、調整、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

在資訊時代，廣義的智力培養，成為生產力之本；在新時代，在職教育的重要性不下於任何形式的高等或基礎教育——職場、業界提供的綜合訓練，和院校培訓同等關鍵。香港是中國最富裕、商業網絡最發達的城市；中國人無論家庭貧富、世局亂治都重視教誨子弟，這裡人均教育資源幾近「印太」區內最高。問題是，無論持任何學歷、從初中到博士後，未踏入社會、未嘗執掌企業者，在結構上講，就不可能創業。白石老人天聰再高，連墨都未研過，難道能成大家？

香港的確有資訊發達、行海洋法、擅兩文三語的優勢；然而，單靠文化和制度基建，而獨欠企業平台，本有潛質成為新馬雲、新朱克伯格的香港青年，也注定要埋沒在產業結構失衡之中。在中、美「稅改」大潮下，透過免稅、甚或負稅，特別是減免地稅，吸引國內外創科巨頭來港設區域總部，可補本地巨企仍停留在「前工業」時代之不足；讓優秀的香港畢業生，就職生涯最黃金的首十餘年，能在產業「少林寺」中受訓，才可能在三十出頭時，為自身、為產業、為社會，打出一片天。

(三之三)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給明年股市傳遞了什麼信號？

李勇 中興匯金高級研究員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在十九大之後首次召開的重大會議，在十九大對經濟定調框架之下的細化和深化，不僅給2018年中國經濟的發展指明了大方向，也為2018年的中國股市定下了主基調。本次會議不再單獨強調經濟增速，而是要求「高質量的發展」，同時，在「市場失靈」較為明顯的領域，政府的作用將更加突出，值得市場參與者關注。

這次會議提出了今後3年的「三大攻堅戰」，而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是這「三大攻堅戰」之首，同時會議強調了防風險攻堅戰的重點是防金融風險。針對股市，此次會議的表述是「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更好為實體經濟服務，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為2018年的中國股市定下了主基調，穩中有升將成為主旋律。

縱觀2017年一整年，中國股市堪稱是經歷了「史上最嚴」監管。這一年裡，管理層的監管行為主要表現為：證監會行政處罰案件大幅增加，大額罰單不斷開出，關停內虛假幣交易所，資管新規的塵埃落定。從這一系列舉動來看，管理層對國內資本市場的整頓力度之大確實是史無前例的。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資本市場「穩中有升」的定調來看，金融強監管將成為常態，2017年「史上最嚴」監管模式在2018年將會得以延續下去。

在「穩中有升」的主基調之下，嚴監管依然是新常態，但2018年的中國股市並不缺少投資的熱點。首先，根據今年經濟工作會議的新提法相關表述當中，市場參與者不僅能到老生常談的國企改革與去產能，而且還可以看到製造強國、科技創新、軍民融合以及降低物流成本等。其次，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了「三大攻堅戰」，這當中的

一個重點是污染防治。作為2018年一項重點工作的環境保護領域，值得投資者重點關注。

再次，在此次經濟工作會議佈置的8項重點工作中強調了要繼續解決好「看病難、看病貴」問題，鼓勵社會資金進入養老與醫療等領域，因此，養老與醫療等板塊領域也是值得投資者在2018年予以適當關注的。最後，區域協調發展建設題材也值得重點關注。8項重點工作中也提到了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雄安新區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為投資者帶來中長期的投資機會。

在2018年，儘管新增流動性未必能夠追上股市容量的膨脹速度，中國股市仍然很難改變以存量資金為主導的市場環境。但是，新的一年裡將不乏市場熱點，新藍籌將有望成為新一大亮點，而投資者也不乏個股投資的機會。



在A股與港股市互通之後，北水越來越受到關注。

走出內耗泥潭 融入國家發展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副主席 新社聯理事長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早前會見到京述職的特首林鄭月娥時，充分肯定了林太和新一屆特區政府的工作。過去半年來，林太帶領香港社會重回正軌，儘管一些老大難的民生議題無法一蹴而就，惟新政府施政方針獲得市民的認同，締造了良好開局。立法會近期通過建制派議員提出的議事規則修訂，也堵塞了反對派無理拉布的漏洞，為香港前途掃清障礙。

事實上，香港多年來在政治波瀾中浮浮沉沉，反對派怪招盡出，無論立法、公共行政撥款及基建項目通通受阻，早已惹人厭。尤其是十九大開啟國家發展新時代，愈來愈多香港市民明白，我們是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盲從政客對抗中央，癱瘓政府施政，只會令香港坐困愁城，唯有抱著「同坐一條船」的心態，積極融入國家大局，香港經濟民生發展才能乘風破浪，有所作為。

縱然香港曾陷於內耗泥潭，十九大報告卻指明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大方向，習主席也重申，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兩地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的必然選擇，我們必須明白，香港沒有理由再讓政治爭拗拉後腿。

新年新氣象，如今特區政府應未雨綢繆，預計與內地合作時可能出現的困難，集思廣益，減少阻力。向來靈活變通、善握機遇的香港人，亦應該與特區政府同一陣線，堅持「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在國家大格局中審視香港的角色和定位，把眼光投到整個大灣區的互利合作，以致「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善用背靠祖國的優勢，邁上新的發展台階。

中國經濟新時代 香港需尋新定位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十九大後的首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式提出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確定長期堅持稳中求進的中國經濟新時代，推動高質量發展，深化去槓桿等結構性改革，加大培育新動能與強化科技創新，帶來眾多投資機遇和合作共贏空間。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享受國家發展的紅利，就要尋求新定位，抓準新途徑。

會議指出，十八大以來，中央堅持觀大勢、謀全局、幹實事，攻堅克難，成功駕馭了國家經濟發展大局，取得歷史性成就，推動歷史性變革，並為其他領域改革發展提供重要物質條件。國家經濟發展已進入新時代，由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這需要一套能夠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推動高質量發展新態勢、穩中求進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更要加快形成、優化和創建相關的系統建設和制度環境。

任何變革、開拓、創新，都必然會

面臨傳統利益和價值的反撲，以及超乎想像的挑戰和狙擊，無論是自身轉型而需要克服的困難，抑或是全球政經顛簸帶來的衝擊，長期堅持稳中求進，積極探索務實新政，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底線思維，一步一腳印向前邁進，既不為短期經濟向好衝昏頭腦，也不因面臨困難和風險而自亂方寸。

金融列未來3年「風險攻堅戰」

今年的會議圍繞在新時代的新氣象，讓發展朝高質量升級，除了提出8項施政重點外，特別點名金融、房地產、實體經濟三方要形成良性循環，還將金融列為未來3年「風險攻堅戰」。在會後新聞稿中，用詞最嚴厲、重複最多次的，就是金融風險，當中提到要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以及基本穩定的人民幣匯率與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香港，既是國際金融中心，亦是國家金融窗口，做好金融體系內部良性循環互動，做好重點領域風險防範和處置，堅決打擊違法違規金融活動，加強薄弱環節

監管制度建設，都是我們的責任和使命。

這些都是指導今後中國經濟轉型及發展的基本原則，將使內地經濟產生積極而重大的變化，亦創造出寬敞的投資機遇和合作共贏空間，港人只有認識和把握這些變化，才能夠抓住當中的巨大商機，搭上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列車，享受國家發展的紅利。

香港需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以「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為切入口點，就要超越所謂「開小灶」的放權特惠模式，依靠產業升級和開發創新轉型。香港的經濟發展模式愈趨單一，缺乏新增增長點，只有認真研究國家的大策略、大政策，抓準配合和利用的途徑，才能讓香港在新時代與內地併船出海。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不少港人變得內向自戀，失去了向外看、向外衝的視野和意志。隨着國家經濟崛起，香港在區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戰線中，已由龍頭變為輔翼。面對發展大潮，香港必須自省自重，重新定位，認真研究國家的大策略、大政策，抓準配合和利用的途徑。

完善機制協助罕有病患者

張偉麟 醫生 醫院管理局聯網服務總監

過去幾個月，坊間有不少討論都是關於罕有病病人的照顧，當中較有爭議性的一個討論點，是有否需要為「罕有病」作出一個明確的定義。要討論這個問題，先要由香港的醫療制度作切入點，很多人認為為罕有病作出明確的定義，指明哪幾種病屬於「罕有病」才能為病人作出最全面的保障。在實行醫療保險制度的國家和地區，這可能是需要的，有定義便能列出名單，這樣才能界定保險及制度是否覆蓋個別病症。另外，其他國家和地區建立名單，可以鼓勵藥廠、專家等去研發針對罕有病的特效藥。相比之下香港並無同樣條件。

香港的醫療制度與外國不同，奉行是「沒有市民會因為經濟困難，而得不到適切的醫療照顧」的核心理念。香港並沒有醫療保險局，醫院管理局

以「高補貼、低收費」模式為香港市民提供服務，變相是為所有市民提供全民覆蓋的醫療安全網。只要是合資格人士，如選擇使用公營醫療服務，便能以極低廉的價錢接受醫療服務。對於有經濟困難的病人，香港有費用減免機制。這個安全網覆蓋所有病人，無論是罕有病或普通病，同樣受到保障。

這個保障亦不只是涵蓋一般的基本需要，香港的公營醫療服務是達到國際水平。不過這個安全網的覆蓋範圍亦不是無限，超出這個範圍的服務，市民需要自付費用，但可以繼續在公營醫療系統中接受高補貼服務。就一些有實在醫療需要而需自付的項目（如某些藥），現時已設有「撒瑪利亞基金」及「關愛基金」作為第二層安全網，為有經濟困難的家庭提供補

助。罕有病與其他病的病人同樣可以受到保障。

但罕有病是一個好例子，點出現有醫療制度在科技急速發展帶出的新挑戰。罕有病的主要特點有三：第一，以前沒法治療的情況現在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治療；第二，因為患者人數少，所以藥廠往往將藥物放在一個極度昂貴的水平；第三，藥物就不同群組的病人效用不一。但就以上所述，在患有普通病的病人亦會出現。所以現時最需要的是將現有系統再優化，應對出現上述狀況病人的需要。

如果要為罕有病作出定義和優化現有機制兩方面比較，後者明顯更能為罕有病病人帶來實質的協助。作出定義只會將不符合定義的病人排於門外，因為「定義」解決不了問題，只有優化機制才真正幫到病友。